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八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三期（zk181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乱世人生】	雪泥鸿爪	曾文龙
【往事非烟】	亲历清华“七二七”	韩爱晶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徐友渔
【史实辨析】	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	艾 群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乱世人生】

雪泥鸿爪

• 曾文龙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

清华文革老五届，绝大部分是折翼的一代。一场史无前例浩劫，彻底扭转了我们这些生不逢时、本是“学之骄子”的前途和命运。

我不过是一个尤其不幸的人而已。往事不堪回首，国情禁锢语境，围墙内谁也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几十年不想写自己的特殊经历。现在已过古稀之年，记忆早丢三落四，再不写就完全湮灭了。

也许，有些校友或因在文革的头两年半积极介入上层政治斗争，或因武斗致伤人死人，而遭过短暂关押，登记在案。而我很另类：既非团、亦非四，基本逍遥派一个，却以思想罪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个十八年！在狱里悲惨煎熬度日如年，直至四人帮垮台三年半多，才平反脱离苦海。并且霉运继续如影随形，一辈子挥之不去。

我和全国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同班，还曾睡一床上下铺。蒯追随毛伟人干了不知多少错事坏事，四人帮垮台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十七年，比我还少一年。我们那张床上下铺是价值观一左一右，仿佛命中注定都要坐大牢似的。区别是：我因四人帮垮台得平反，他因四人帮垮台才判刑。

我为何会遭到飞来横祸？起因就是1966年6月当了几“蒯派”——清华人都知道“蒯派”这个词怎么回事，可是外人不知道。我一连串的故事，或说事故，由此而展开。

1966年6月22号，化902班“十人小组”在清华大礼堂前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其上签名的十个人中有我。当时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通知我班，王光美要与我们座谈，不料却来了个“假货”，我们提出质疑写成此大字报。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全校师生眼球，工作组与蒯大富6月24日在清华大礼堂激辩一场。

著名的6·24辩论后，工作组宣布我们十个人“反工作组即反党”。这回王光美露面了，把我们严厉训斥一番，然后分别隔离批斗，冠以“蒯派分子”。将我们九个人，加上支持我们的王大定，分开押在五个班看管和“帮助”，就剩蒯大富单枪匹马可以继续写大字报对抗工作组。

但形势总是峰回路转，给刘少奇设了个局的毛伟人很快回京，一挥手让工作组卷铺盖走人。原来，我们是一不小心卷入到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漩涡中心！

本以为此事会像大家熟知的电影台词：“平安无事咯”——殊料，这“十人小组”大字报，被成为毛万岁大红人后春风得意的蒯司令，收编到《蒯大富大字报选》作为头篇，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大地，连我在广州的亲友都看到过。又天知道五年后这篇大字报的10人签名会发酵，对我搞出个如临大敌的516审查！

先回顾一下我在清华文革的两年多岁月都做了些什么。

其实文革之浪未冲进清华园的1966年5月，我刚跑完800米为了赶晚自习立即洗了个冷水澡，就忽然患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倒，用药不当，引起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在校医院一住五个星期，连《材料力学》也未能参加考试。出院几天，即逢文革爆发，清华园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参加了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战斗。随之，被打成蒯派分子。我又病倒了，这次又是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4个+），工作组还未撤走我就重新进了校医院。

周总理8月4号晚来清华给蒯派平反，我半场顶不住得先回医院。

我感到自己身体太差，没想跟着老蒯再折腾。老蒯那时还出了张大谈“权经”的大字报，我认为我俩人生目标不同，他注定要捞政界，而我是想做学问的人。此后，我完全退出十人小组的活动，他们增加了王大定和史复有，成为十一人小组。

这次住院有个把月，我有时也溜出去到大礼堂一带看看大字报。校医院很清静，是思索的好地方。我开始冷眼看狂潮，首先是对打砸抢抄破四旧大毁文物不以为然（对中华文化遗产至今的东西应甄别，即使认为昔是今非的东西也要保护留作文物让后人参观），我认为这种破坏是把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命”？当听说红卫兵去山东砸孔庙，把我祖宗曾子的墓也挖了，我更反感。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毛伟人不是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动动脑筋，都要问个为什么吗，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毛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他又为什么能从中央到地方“踢开党委闹革命”？凭什么可以抛开宪法和党章罢免大部分同僚并批斗？程序合法吗？党内大清洗有必要把我们大学生的课也停了吗？……我把这些随想，简短记入日记，秘不示人，没曾想给自己留下了极大隐患。

身体恢复后，我从10月初开始离校“大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领略各地的人文风貌。12月在昆明胃出血，由同学护送回来。第二年又溜出学校三次，想尽办法把祖国半壁山河看了一遍。这得益于我大二大三时当过工化系学生会干部，曾与系会主席鲍浪策划组织全系同学去十三陵、长城八达岭、香山八大处三次旅游，认识了各年级不少同学。1967

年我游了许多地方，都是在别的年级同学帮助下，甚至招呼我到他们家里吃住好多天，大大方便了我。

我对老团老四的斗争不感兴趣，认为两派都是“左派幼稚病”，是如来佛手掌心的拳击赛，不是真正的大民主。放眼全国，文革就是大型绞肉机，从上到下互整互害，谁都说绝对忠诚于毛，至死不敢质疑半点。我自以为当逍遥派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68年春，我第四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院不久目睹同窗操戈的清华两派“百日武斗”开始。我观看了东区浴室惨烈的攻防战，后来就不忍再去看这种同学间自相残杀的场面。

这时，蒯大富找了我，说：“我老团实力明显大于老四，一定能彻底打垮老四统一清华园，成立革委会指日可待。你总是逍遥，身体不好又想将来分配回广州工作，而将来我大权在握可决定你的分配。所以你现在得为我干一件事，就是为我准备一篇发言稿，等到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那天开大会用，内容是批判清华党委17年来执行的教育路线。怎么样？”我想了想，同意写，但需让被蒯关在牛棚的原校领导、系干部给我提供素材。于是，蒯大富把我班的邵凯胜（清华井冈山组织部长）叫来，带我去生物馆。

生物馆里关了几十个人，我看着老团“第二办公室”的看守给他们派饭。认得的所谓“黑帮”有胡键、何东昌、艾知生、滕藤几个，不见蒋南翔校长。他们都脸色灰白很憔悴。

我拟了两个题目：1，你认为清华17年是否执行了毛的教育路线，举例说明失误或成果；2，对比解放前老清华的教育质量，你认为优劣如何，举例说明。

邵凯胜吩咐“二办”看守人员以后把老干部写好的材料拿给我看。

大部分时间，我们好几个人跟着物九的戎月莉学太极拳、太极剑、初级刀、查拳，过得很愉快。直到工宣队进校，蒯大富未能打垮414一统清华，我也未动笔为他写这篇就职演说稿。

我一直盼望的复课，空等了两年多。捧着老毛所赐芒果的工宣队占领清华园后，奉旨将全部老五届学子作为处理品匆匆毕业打发走，我的清华学业从此终止了。后来不让考研究生回炉，一生就此定格。

1969年元旦，我赴广西最大的制药企业报到，在南宁制药厂当工人。我一生的快乐时光随六十年代戛然画上句号，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代正张开虎口扑面而来。

1970年春，不记得是一月还是二月，仅凭《蒯选》第一张大字报上有我的名字，清华学府的掌印者迟群、谢静宜，专门一纸公文去函广西，要求将我作为清华516重要头目清查。南宁制药厂革委会主任和三个军代表，立马成立专案组对我专了政，抽调十几个民兵全脱产，日夜荷枪（开头还实弹）轮值。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勒令我交待与蒯大富都干了什么！

我和蒯文革交集的事情就那么几天，屁大点事，写了一页纸就再也没什么好写的。蒯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就睡在别的地方，我逍遥派一个，千真万确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

专案组跑了几趟北京，没查出我有何问题，但不肯放过我，从第二个月起，让我整年在几个民兵监管下天天挖防空洞，星期天再加上工厂里十来个“4 2 2牛鬼蛇神（骨干分子）”一起干。对我的5 1 6审查关押，历时竟长达1 4个月。后来才知道，化9 0 2十人小组其他同学的审查半年就结束了，而广西山高皇帝远，迟群谢静宜早就把我忘了，才不管我的死活呢。荒唐的是：十四个月后，专案组才想起要到清华问问怎么搞下去，回来突然就放了我，叫我像以往那样正常上班。

5 1 6审查结束，却居然不给我作个否定结论！三个军代表不明不白写了句：“此人经5 1 6审查”，就塞入我的档案袋，像如来佛的五指山压住孙悟空，要镇个五百年。——被“5 1 6审查过”，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我“历史污点”，黑我一辈子。我真比窦娥还冤啊，我真的至死都不会明白这“5 1 6”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在恢复自由重新到车间上班后，每次返广州探父母都极力去找单位联系欲调走。而那几年，一次又一次原本都说好可接收的单位，总是调档案去看后就退。终于有人告诉我，档案袋里有这么个东西：“经5 1 6审查”！

——这还只是办调动所碰到的阻力，以后几十年，还不断遇到“此人不能重用、提拔”的阻力。

我找南宁制药厂政工科论理，他们推托：“你的确被审查过。又没说你是5 1 6。现在军代表走了，我们无权拿出来。”

厂革委会主任于青槐，是原来在监狱管劳改犯转业来的军官，对所有职工都凶巴巴的，职工背后都叫他“土匪”。我血气方刚，敢当面顶撞他。这家伙很记仇，总拦阻着不让我调走，明知我身体弱小多病，还年复一年地尽让我干重体力的活：仓库搬运工啦，拉锅炉扒出来的热炉渣去填水塘啦，挖防空洞啦……累得我不到三年就胃出血四次，连在清华的岁月，我一生总共8次消化系统大出血（3个十号以上的）。

很多群众对我很同情，生活上给予各种帮助，劝我不要硬碰。

有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带我到几十公里外的武鸣县农村，介绍我认识一位4 0岁左右的奇人黄某。黄大哥热情地接待我，同意医治我的胃溃疡病，并只收了我很少礼物。他给我服用了三剂药（每剂不同），就真的神奇地把我的胃病彻底根治好了。时至今日，四十多年随便喝酒吃辣及以前不敢沾的食品如萝卜、榄角、酸菜，都再没半点复发。黄大哥是个农民，其实不会看病，必须拿医院确诊是消化系统溃疡的病历，大出血过的，他才给治，但保证治必痊愈，永不再犯。除此之外他并不会医治别的病。他的师父要他立誓不得外传，临终只传子。后来听说他没来得及传子就意外车祸，不知世间是否还有此绝世秘方？

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否则我有那老胃病肯定挺不过不久接踵而来的严酷监狱生活，早就人命危浅呜呼哀哉了。

## （二）

努力几年想尽办法调动都走不了。我的霉头越来越重，终致身陷囹圄。文革绞肉机要吞噬谁，连国家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都不能幸免，我小民一枚当然厄运难逃，唯无可奈何受碾压。所以我后来很佩服六四去国的万润南，那是自保唯一之路。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韦国清的土皇帝地位一直稳固，他对422派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毒辣。什么揪出“反共救国团”，炸水库决堤坝淹死大量躲在地道的422群众，出动正规部队用坦克、重火器剿灭422武斗人员，不惜把南宁三十几条主要马路差不多轰平（我刚去南宁时看到的废墟景象有如电影《攻克柏林》大结局），地上到处血迹斑斑。广西不但多处发生将“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全家灭门的惨案，还要吃人肉、心、肝，生殖器泡酒喝……真是惨绝人寰！我亲自问过两名吃人者：“你有人性吗？不知道这是犯罪吗？”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是阶级敌人，我吃他们何罪之有？你什么立场？”

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总有不少人死在沙滩上。

我在南宁已很注意对广西两大派的事情一概不表态，但由于清华的老团、老四以前到广西串连都一律明确支持422造反派，所以广西联指派和韦国清都十分痛恨清华大学出来的人，我躺着就能中枪。

1975年12月，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至广西，厂政工科背后让职工揭发我的日常言论。被吓的个别年轻职工说我在跟他们喝酒时，他们谈到文革打倒许多将帅、高官的事，我讲了一句成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工科马上成立专案组，上纲上线为“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于是开大会宣布把我隔离审查，关在厕所旁的房间，蚊蝇多得差不多可以把人抬起来，民兵在外站岗日夜严密看管。

上次516审查只是要我交待与蒯大富干了什么，没搜我的东西；这次不同了，强行把全部物品仔细翻遍。不但拿走日记、笔记本、信件，还顺手牵羊把我全部邮票取走，没写清单。我从8岁跟别人开始学集邮，不但拥有1949年后的很齐全好品相的票子，而且拥有清朝邮票四五十张（不敢集国民党时期的邮票），其中“慈禧60大寿”和“宣统登基”两套是我最珍贵的新票——后来平反，这些价值不菲的邮票就通通没发还给我，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今天可是几百万以上的财富打了水漂啊。我现在重新收集1949年后的邮票，再也无法集齐全。

这下一“抄家”，我的日记里曾断断续续记有的对文革的一些“随想”便曝光了。

政工科整理成材料上报，而姓于的“土匪”与南宁市第三把手肖寒（他女婿颜景堂是广西联合派的头领）是同村人，更亲自直接把材料送肖寒家里。肖寒转呈广西土皇帝韦国清。这样，我被韦国清选中作为广西批邓的头号活靶子，写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批邓文件往下发。1976年四月初，公检法对我正式逮捕，关押到南宁看守所。

我被戴上“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这成吨重的帽子，轮番拉到省市直属机关和工矿企业，挂大牌子并“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人们高呼口号总是第一句“打倒邓小平”，第二句“打倒曾文龙”。

当时公检法合并，审讯过场的形式是这样的：公安两个人问“这些物品是不是你的？”就要我在笔录上画押，历时仅10分钟；然后检察员一个人来复核，更快，几分钟完事；审我的法官是个女的，也只有一个人，问话约半小时。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司法程序。后来问其他犯人，他们说这样快走过程是好事，没尝过稀奇古怪的刑具是很开恩的了。

我面对法官，不承认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诛杀开国功臣”，在我日记写有的东西我承认，但强调是个人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疑问，从来没向外传播过。我在清华大学几年，连

两派都没参加，自出娘胎更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根据宪法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公民权。

法官申斥道：“你吃了豹子胆！连毛主席都敢攻击？你不承认含沙射影？可我有人证物证，就能判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他一个脑袋顶我们六亿个脑袋，难道你自以为比毛主席还聪明？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这就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所以，你不能享有宪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说“这不符合逻辑，应先有宪法保护我的公民权，而不能先定罪再剥夺我的权利。”

法官说“少废话。告诉你，以你的罪行，我完全可以枪毙你！！！我还是认真了解过，你出身很好，社会关系也清楚，就手下留情只判你个十八年，好好改造吧。”

我说不服。她说“我们把你送去该去的地方，你一定会服的。审讯结束。”然后她按了一下铃，叫人把我押回看守所。

8月23日，召开了南宁市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刑期18年。四大罪状：1，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为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2，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3，丧心病狂攻击江青“想当武则天”；4，与邓小平一唱一和，攻击文艺界只有8个样板戏“一枝独秀。”

宣判后，两辆大卡车站满了军人手持冲锋枪，押着五花大绑的我，在南宁主要马路游街示众了一大圈。挂着沉重木牌子的铁线，把我的后脖勒出半个月还深深一道血痕。

我就如此从清华大学的最高学府，无端跌入苦难深重的囚牢，不禁泪如雨下……只能叹时也命也运也！

### （三）

在游街示众的车上，闭目回忆起1963年，我以广州高考探花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状元是物九的唐孟希）。大一，我入学即被任命为化九五个班的“年级总学委”，亦曾壮志凌云，希望学成后能为国家的原子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注：化九、物九，是1963年入学、1969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六年制。）

我父母都是纺织工人，家族所有亲戚关系差不多都是产业工人，而且都从无出过政治问题。以共产党的阶级成分论讲，是所谓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大一时，我还曾一度被辅导员们挑去听党课，列为年级第四号培养对象（王连生、段德智、葛汝明三人很主动，上学期即成预备党员）。

再回想到我的中学——广州实验学校，即南武中学，建校比清华大学还早，师资雄厚，学风严谨，我深得其益。那时文史哲数理化我都喜爱，唯从小孱弱不善体育。我由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生干部，如团支委，学生会宣传部长、学习部长等。

……总之，文革前我是老师们都寄以厚望的好学生，认为将是“政治、业务双肩挑”大有前途的好苗子。

广州在中国近代史是个风云激荡的地方，涌现过无数思想家、革命家敢为天下先，这熏陶了我喜欢分析、质疑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成败祸福。

文革前，我第一次捅的娄子是被叫去听党课，就碰上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导要绝对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不知天高地厚，讨论时大发议论说：马克思教导女儿要“怀疑一切”，清华学子如果只知盲从不敢突破怎么会有学术新发现？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新。党史也告诉我们曾有过几次重大路线斗争，说明领导不等于永远正确，毛主席就没有盲从，还叫我们“凡事要问个为什么，想想是否有道理”，这“做驯服工具”提法很不科学。——主持党课学习的年级辅导员吴福祥马上把我拉出室外，黑着脸叫我以后不要再来听党课了。——后来化九年级陆续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吴福祥却不再理我。（吴辅导员文革结束就跑到他原来最憎恨的美国去了，听说现在在明尼苏达大学。）

我那时倒觉得入不入党无所谓，真的一辈子没再考虑加入这个要无条件服从的组织。我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天，我们化902的班主任曾宪舜找我了解情况。可能是同宗关系，比我大十来岁的曾老师一向对我很好。我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批评我，只笑着说“看来你是当学者的料，不是当官的料。”几十年来我视曾老师亦师亦友，每次出差北京都必返清华园见他。

我那时为什么对入党没兴趣呢，是由于我有了一个梦——大一上学期，我突发奇想，欲探究科技进步在中华民族兴旺过程的作用，去清华图书馆翻阅借书目录，发现只有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单专业的学科史、工艺史等方面的书，却没有一部全面综合阐明整个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著作。我暗自兴奋，不知天高地厚，立志要搜集资料，写成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发展史。心想除学好核化学专业，我这辈子就要写出这部书。我那时认为只要内容翔实全面，观点基本正确，即使水平不逮，在这领域由我开创，就可扬名立万了。我开始抄录、做卡片，记录重要参考书刊的索引，构思写作框架，还每期必读图书馆摆出的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我这时把我心中这个目标告诉了曾宪舜老师，但请他为我保密。我知道清华图书馆每个寒暑假都会雇一些学生打小工，搬书腾库、登记新书、贴借书袋、修补破旧等，还给点零花钱。我请曾老师介绍我去图书馆做假期小工，以便进里面找我要看的资料。曾老师一口答应，说正好我们工化系党总支书记腾藤的女儿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领我去见了小腾老师。

这样，我连续三年寒暑假都没回广州老家，留在清华园为实现我的痴心梦想作准备。我在图书馆找到不少我要看的书，特别是发现北宋有个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几十卷，把我国宋代前的科学技术发明已作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并且他自己有不少研究新发现，令我惊奇和钦佩不已！我知道以后要多读书多跑地方考证。

我那时想：我国的伟大发明岂止“四大发明”！何况指南针只对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立了功，火药更被西洋人利用把我国打得割地赔款，都算不得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荣的最伟大发明啊。反不如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烹调技艺、中医和中药，以及文房四宝和活字印刷术等，对我们种族兴旺和文化遗产更为重要。我们的祖先，连神秘的人体经络和穴位都能发现，圆周率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煤和石油都是我们古人率先使用……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为什么中国涌现过诸子百家，却没有形成希腊那样成群的科学学派呢？为什么后来更整体科技掉队，远远落后于西方，如今只有追赶和模仿的份呢？是什么根本因素，阻碍了中

国的科技发展？我认为研究科技发展史最重要是探索这个问题。自由思想，才是科技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文革来了，我们被迫全部停课，图书馆关门，我的梦嘎然中止。

到八十年代，已回到广州工作的我突然在新华书店发现英国学者李约瑟出版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煌煌巨著，我犹如被人当头一棒。我草草翻阅了一下，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条件像人家那样做学问，前思后想彻底死心了。我回家把历年的笔记付之一炬。从此便没有了梦。业余集中精力去当星期六工程师，挣钱养家。

#### （四）

监狱，对于作奸犯科的刑事恶徒来说，或许是改恶从善的地方；但对犯思想罪的人来说，却无论古今中外俱适得其反，让受害者更勤思索更趋觉悟而已——因为真理从来都不是压服的。

我在看守所呆了四五个月，再押解到了广西第一监狱，即英山监狱。那里关的全部是刑期15年以上的男犯，有一万二三千个犯人左右。四面环山的盆地，十几米高的围城，上有电网和机枪，军人全天候严守。有两次发生犯人逃跑被打死，要我们端着饭盒排队一边吃一边看。犯人都是被开花弹打死，或内脏大翻开，或半片脑袋炸飞，狰狞恐怖。所以，别想逃跑。

犯人一进鬼门关，就得换上拼缝得极难看的防逃囚衣，原自有衣物焚毁，我后来平反都只有穿此囚衣一路在鄙视的目光下回到家。

犯人全月伙食费仅5元，包括定量45斤米的全部伙房开支。长年累月一天三顿只有盐水腌白菜或南瓜佐饭，食毕饭盒扔水池也飘不出半点油花。每月杀一次猪，人均一两开斋。逢春节国庆中秋加点冻肉厂拉来的积压内脏、小鱼，都吃得津津有味。平时能抓到昆虫挖到蚯蚓逮着老鼠，绝不浪费。我们整天都觉得饿。

另有2元入账本登记，每月都有一天由管教干部带两个已服刑多年的老犯人出去集中为各人购买牙膏肥皂、火柴香烟、纸笔信封等，不能买食物。半年可写一次家信，必须交管教干部先看和收发。

约五六十犯人编为一个中队，睡上下两排大统铺。早上6点吹号起床劳动，晚上10点关灯睡觉。每晚饭后开会，背诵《监规》并自查，然后众人批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每周一次轮流报罪状并认罪自批。每三人编成固定一组，不论何时何处三个人都必须一起行动，包括寒冬夜大小便，也得三个人一起跑出百把米外上厕所。一个政治犯要指定两个刑事罪人作“同伴”，理由是刑事犯只危害个体，政治犯却危害全社会。

初来乍到，要背熟二十几条“监规”，强调必须认罪伏法，好好改造。

我从一开始就只肯“伏法”，不肯“认罪”。第一次轮到我自报案情，我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准备为国家搞原子弹的。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两派都没参加，没干过任何坏事，我认为我只属于思想认识跟不上，不是犯罪。”——这下子，把所有人都听得眼睛瞪大了许多！这监狱从来没人敢不认罪。几个管教干部马上喝令我“闭嘴！”，然后让大家批判我。但没有发生殴打我的事情。



批判结束，我两个“同伴”警告我，等着关“单监”！

第二天一早，其他犯人列队去工作，单独留下我。有两个管教干部领我去监舍最偏远处，那里有一长排暗无天日的小笼子，每个笼子关有单个带着手铐和沉重脚镣的人，饭从小洞塞入，几个月没有放风没有洗澡，肮脏不堪形如鬼魅，很怵人。

管教干部问我：知道违反监规、不认罪伏法会怎样了吧？

我答：我不会触犯监规，但我不会认罪。

居然没锁我，把我带回其他犯人劳动的地方，叫那两个“同伴”看紧我，就没下文。大家都非常惊奇，说我够特别的。

过了两天，王副监狱长单独和我谈了次话，然后说他会去南宁法院了解情况再说。

大半个月后，他找我说：“法官向我交底，你的案子是韦国清亲自拍板定的，改不了；由于你不肯认罪，法院派人和我去了你家，要你父母签字，你父母也不签字，说你想为国家搞原子弹才考去清华，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现在对你也同情，但我们是看牛的，法院叫杀谁就杀谁，叫放谁才能放谁。”他压低声音说：“北京上头有了新变化，江青几个叫四人帮的被抓了，你的案子或许有转机，说不定很快平反，或有特赦的一天。但我忠告你，未释放一天就老老实实遵守监规一天，不然没好结果。我明天让你转到技术室，与图纸打交道，既发挥你的专长，也不那么辛苦。”

一年等一年，我到平反出狱再没见过他。但我心里得到安慰，他是个有良知的人。

我每半年递一次《上诉》。四人帮垮台已三年，韦国清还一直坚持喊“广西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是没有胡耀邦，文革无数的无辜犯人无论怎样申诉都只能沉冤不雪。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监狱一万几千个犯人，除少数人派去种菜外，其他人分成很多工种，从浇铸到总装，生产一种六缸V型柴油发动机，每天都有十几卡车的成品运走。后来还自行设计增加生产一种重型卡车。技术室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的犯人，跟着一个刑满留场的老工程师，从设计、绘图到编工艺等，负责全部的技术资料。我们离生产区远远的，平时管教干部一般不来监督，午饭后还可趴在制图板上睡半小时。

我的“同伴”说，“劳改了十几年，看见不认罪而不被关单监还优惠工作的只有你，再就是××中队那个林泰，就你们两个人啦。”他们偷偷带我去“串监”，认识这位另一个大队的特殊人物。

林泰，就是电影《英雄虎胆》主角曾泰的原型，任柳州市刑警大队长，因“吹捧邓小平”，判15年关进来了。他更硬气，不但不肯认罪，而且任何劳动都拒绝干，在监舍里自由自在的。我从他那里听到了美丽的阿兰小姐与他真心相爱，帮他完成任务的故事。结局是林泰虽然成了周恩来授勋的“新中国十大侦察英雄”，而极左的顶头上司不但不让他们结婚，反而秘密把阿兰小姐枪毙了，阿兰小姐不是传说中的死于自杀。林泰从此神经变得有点不正常。

更令我感慨的是，1979年11月底我无罪释放时，比我还早一个月拿到平反判决书的林泰就是赖着不走，要求派飞机送他去北京见邓小平。他后来如何，我就知道了。

监狱里三教九流、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构成特殊的社会生态，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的人渣就不去说它啦。而因文革是造反派422各地的头目干将的被关不少，422总头头熊一军找到我，原来他的妻子是我在南宁制药厂的同班组工人。因用印有老毛头像语录的报纸擦了屁股的、失手跌碎伟人石膏像的、老毛死时只知买红布准备结婚或试剪双喜字的，自己生日家宴被举报及不合时宜聚众吃狗肉“涉嫌庆祝”……如此这般入狱的，广西就达过千之众。技术室就有个大学生，下班回家看见笼里的鸡有点蔫就杀了吃，马上五花大绑，以“幸灾乐祸罪”判15年，妻子离婚。他神经兮兮了，每过不久就自言自语。……老毛离世，也要无辜累及华夏苍生多少家破人亡！这个世道正常吗？我估计后来英山监狱拨乱反正的案子会有一半人。

英山监狱里没有任何报纸杂志及广播，听不到任何外界信息，更不像老蒯坐牢那样不用劳动，每月吃45元伙食，还能看电视、学英文。广西监狱图书室唯一有的是马恩列斯毛的全套著作。我可能也是唯一耐心通读了这些书的犯人。我发现马恩每本书的扉页那句“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中文全变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有玩味之处；我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论根据是商品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创造，而不考虑提供厂房、原材料、运输、管理等资本成本，是否正确？我发觉恩格斯晚年在修改马克思早年的主张，从巴黎公社的革命转向议会斗争夺取政权……；从列宁断言资本主义世界已到垂死挣扎阶段，为何几十年东风还压不倒西风？中国历朝历代肇始，统治者都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为何老毛要“不断革命”，一批批地将自己人陆续地打成敌人，推向对立面？……我想，出狱后要多看近代历史资料，研究两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全人类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白坐这个牢，我要做个明白人。

我在监狱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某天，我小腹剧痛非常，完全不像过去的胃疼。便向管教干部报告。在我的“同伴”陪同下，到监狱医务室看病。

那个医务室只有10平方米面积，只有一个中年犯人吴医生，也只备有简单的治疗感冒、拉痢等小病的药。

吴医生一检查，即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马上要开刀。他让我等着，自己去监狱外领取手术器械：一把手术刀、一把手术钳，缝针和羊肠线，碘酒和酒精、纱布和药棉，还有一小包止痛药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就在这个没有消毒的房间，没有麻醉药，没有助手，吴医生给我做了约一小时的手术。没有麻醉药，他就用纱布包裹着短木棍让我咬紧不松口（防止因痛咬断舌头），又用布绳子把我捆在窄窄的病床（防止因痛手乱动）。他安慰我说，他原来是有名的外科主任，做过无数盲肠手术，叫我放心。条件如此，必须病人配合。

我在体验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滋味下，吴医生的确麻利，落刀准，很快地取出我已变黑的盲肠，让我看了，说再耽误你就会腹腔炎感染死亡。他很快缝好伤口，给我服了止痛药。手术很棒，愈合后只留下浅浅1.5公分长的疤痕。

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有次碰到一个女病人非常漂亮，实在忍不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忍不住笑起来。他马上制止我：“缝线有限，你把伤口笑得崩开，我没法救你”。我又从鬼门关脱险。

我像永远记得那个治好胃病的农民一样，也不时记起这个治好我盲肠炎的大夫。很感谢他们，我生命里的恩人。

## （五）

失去四年自由，我终于重见天日。

那时，户口、粮食关系和档案，把每个人管得死死的。我不得不回南宁制药厂上班。判刑时全市声势浩大，平反时悄然无声。

中央有文件要给我这样的文革冤假错案补发工资，应拿回两千五左右。厂政工科说，这几年你不在我们工厂上班，你问法院要；法院说，广西穷没这笔钱开支，你向中央要。还居然威胁我：“还要工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

讨薪无果，我气得给邓小平写了信，当时没复印机，我去照相馆把平反判决书拍成照片附在信里寄去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了信，让广西新掌门人韦纯束处理，于是我去找了韦纯束，见了一面。这一闹，才拿到我应得的工资。

我向韦纯束提出第二个要求：调动工作回广州。法院说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是我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他说他很忙，以后再办。我再求见韦纯束均被挡在门外。

又过去一年，我心急如焚。

我仍是单身汉一个，有大把空闲时间，我发现南宁有几十个清华校友，于是心生一计：广西当局不是忌惮清华两派都支持4 2 2吗？我干脆把清华人都串连起来成立个校友会，也许……我怀着不纯动机花了许多时间真的把广西校友串连起来了，一打出名册，达1 5 0多人，最老是1 9 3 3年毕业的广西大学尹教授。我写了封信给韦纯束，送到区政府传达室，告知我要召开清华大学广西校友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附名册一份。结果，第二天我外出，下午才回到厂宿舍，门卫说广西政府办公厅主任在我宿舍门口等了足足五个钟头了！他要我取消成立清华校友会，我拒绝了。他说你明天来区政府，韦主席要见你。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韦纯束。他说：“你不是想调动回广州工作吗，我与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有交情，可以帮你解决。你取消校友会好吗？”我说“过两天就开会，全体清华校友都通知了，校友会是清华人互相联络感情的组织而已，要取消没理由，我只能不发言，交给别人发言。反正我能回广州，你就不用担心我利用这个校友会让你不放心。”韦主席点点头，吩咐办公厅主任打电话叫南宁市组织部长过来，同时当面写信给梁灵光，还读给我听。然后交给蓝部长让他买机票即去广州办理。

终于，在两个省长帮助下我回到广州。梁省长经广东省医药管理局田局长把我安排到广东省制药工业公司，干到退休。

我高兴得昏了头，竟忘记要求韦纯束把我的档案袋清理干净。

“经 5 1 6 审查”这句话威力很大，后来制药公司和管理局考察干部时，曾派丰子义主任去南宁去清华调查，也找不到我有什么问题，弄不明白为何留下这句不明不白的“污点”。丰主任告诉我，“你出身很好，能力也强，但不敢用你。我知道你很冤，没办法。要不你申请入党，我愿意做你介绍人。也许你入了党能改善一下政治状况。”我拒绝了，我无端被弄得这么惨，什么党派都不想参加。

我 3 9 岁才调回广州，急急忙忙开始恋爱，闪婚，4 0 岁有了个儿子。这把年纪了，考研失利，出国无望，庸庸碌碌仅为稻粱谋。在家我是长子，父母对我期望最大，我在整个七十年代的离奇遭遇让他们十分担惊受怕，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亦唯有加倍尽孝。

我刚调回广州时身体颇虚弱，听从养蜂的堂兄劝告，坚持每天服用蜂王浆，坚持体育锻炼、注意保健养生，慢慢地强壮起来了。近 3 5 年来除补过牙，再没看过什么病，隔年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算是大难不死之后福吧。我至今还在工作，按蒋南翔校长和马约翰教授的要求，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了。

## （六）

我在清华文革期间是个逍遥派，老团的头头认识一些，因为他们常常到我班宿舍，而老四头头则全部不认识。我回广州工作后，可能有些校友把的我不幸经历传开了，两派的干将纷纷与我结交。如汲鹏、唐伟、周泉纓……，还有著名的广东造反派武传斌，蒯的好友北航韩爱晶，都与我吃过多次饭。唐伟还带我去深圳大学看望了罗征启学长，时隔六四风波不久。

在 2 0 世纪八十年代中，从清华毕业的老团老四的派性还对立严重，互相攻击。周泉纓就是例子，曾发誓不与蒯见面。

适逢一个机会，让我为两派和解作出了一点贡献。

那时，汲鹏任康华公司南方分公司老总，他知道我与广东省四百多家制药厂熟识，要我找一家大型制药厂合作生产天然食用色素（清华大学化学教研组研究的课题），出口日本。我给汲鹏办好了。刚好刑满重新回宁夏青铜峡铝厂上班的蒯大富，由我一个也在该铝厂工作的中学同学（人大毕业）彭某联系上我，给我来信说，他与罗晓波一见钟情，认识 2 4 小时即决定结婚，打算旅行一趟要经过广州。我灵机一动，找汲鹏商量：“现在清华派性严重，你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两派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作出表率。你拿钱出来给老蒯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请广州的清华两派都参加好吗？”汲鹏果然爽快，立即同意出资 5 0 0 0 元（当时我月薪 6 1 • 5 元），要我实际操办。我先找到广州校友会秘书长列曾彪，让他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校友当主婚人，我和列做证婚人。再请来清华老五届的两派同学，在豪华的花园酒店为蒯罗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连喝两天喜酒，最后一顿是到著名的蛇餐馆吃蛇，把 5 0 0 0 元全花光。汲鹏因此事被邓朴方狠骂并处分，我很过意不去。

这样一来，广州的清华两派群众迅速消除了派性。后来我还成功把蒯与唐伟，周泉纓都拉在一起吃饭，很融洽。

蒯大富和我私交是不错的。但我俩在三观方面却是对立的。他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得宠的“光辉岁月”，不知他是真顽固，还是“不得不毛左”？我和老蒯，和周泉纓都争论不少。看来，文革两派的派性可消除，但国民的价值观对立就难以统一了。

我对祖国未来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好多年前我在化九同学聚会时就打比喻：黄河九曲十三湾，总的大方向是向东，从兰州附近入河套地区或曾流向北（以俄为师），但出潼关后又要往东奔腾的。后来看到杨继绳学长也说过相似的话。我非英雄，但所见略同。

我在化九群说：对历史，你走得太近看，它差不多是直线；你离远看，它其实是上升的大螺旋。

◇ 清华校友评论

▲ 蒯大富：文章属实，写得不错。

▲ 王大定：加些小标题，细化章节更好。

▲ 孙怒涛：文龙兄，一口气拜读了你的大作，百感交集！写得太好了！你也是先觉者，只是没遇罗克那么有名。你的人生曲折，险象环生。没有如遇罗克那样丢命，算是侥幸。值得把你的故事流传下去。（我的）《历史拒绝遗忘》错过了（收录）你的这篇大作，是憾事呀！如果你同意，我向《昨天》《华夏文摘》推荐你的这篇佳作。

▲ 顾耀文：未曾想到老兄竟有如此曲折坎坷之经历，真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的不幸格外令人唏嘘叹息，简直是飞来的横祸。这样的文章只要把经历的事实摆出来，便足以拍案惊奇的！应汇集到清华文革资料中去。

~~~~~

【往事非烟】

亲历清华“七二七”

• 韩爱晶 •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到北京大学俄文楼看看，这是大学红代会办公地点。我校陈良同学代表我常驻。因为身体不好，午饭后，我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么？”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京大学往清华大学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

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想到谢富治的话，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的？”

工人们回答：“不知道。”“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

问了几处，工人们没有谁能说得出内情。清华大学西校门进不去了。我和陈良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清华，外面的人往里走，想看个明白，里面的人没看出名堂，又往外走。进去的人和出来的人如同两股河水在对流。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长李冬民和另一位市革委会女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我们继续往里走，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地喊：“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总之，此时的清华大学，用北京话讲是“炸了锅了！”我们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走到一个再不能向前走的地方，好像前面是工人控制的区域，不允许再往里走。问不清看不明，心里急没办法。我们也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又往外走。我决定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的，蒯大富领导下的散落的学生。我忙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了，在马路边坐着。”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宣示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当年没有手机，如果有手机，历史也许会改写。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革委会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是常委。在电话里我向市革委会工作人员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被蒙在鼓里。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大学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同学，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出去，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面蹲着四五个中学生模样的大孩子，有男有女，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给你们安排。”

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

我们也不散步了，带着他们往回走。我把这几个中学生交给同学们，让他们安置。我就休息去了。因为太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毛泽东主席因此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个半小时，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

7月28日早上大概九点半前后，我们和谢富治一起吃早餐以后，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清华学生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一行车子，向北驶去。车队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从清华大学跑出来的部分学生汇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领导下清华井冈山团派的骨干。当时，北航最大的会堂就是工人俱乐部，这里成了清华学生临时栖身的营地。谢富治说：“我们先去看看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和王大宾等一行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归来。我又坐上谢富治的车一路向清华大学开去。车队到清华大学，先去明斋看望，我们陆续下车，看见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他们面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满仇恨。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的井冈山团派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事。有的工人妇女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很惨痛。自以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识的蒯大富竟能把清华弄到这种地步！

我远远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蒯大富实在是处于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又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破墙破洞、断壁残垣、像电影里战争结束的画面。清华大学科学实验场地竟成了这种情况。这是清华武斗所致。

走上楼顶的大平台，任传仲等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武斗指挥，学生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是真情真泪，悲痛欲绝！我眼前的场景，悲惨而不可思议，魔鬼也很难重新造就如此复杂荒诞的境界。这个任传仲是直接指挥制造命案的罪人。但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冤枉！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蒯大富的部下，清华井冈山团派十几个骨干分子，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我的话显得极不中听。他们希望从我口中说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骗，工宣队是错误的。我发现少数清华井冈山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我不受欢迎，我就走开了。后来听说，包括蒯大富在内，极少数人一直还坚持要抓黑手。

□ 原载《史实与求索》第12期，2018年11月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 徐友渔 •

〔内容提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有权力之争的原因，也有路线之争的原因。之所以能动员亿万群众积极参与，是毛巧妙地把文革装饰成一场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实质上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无关，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

◇ 问题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是一个表面简单，实际上难于回答的问题。它看上去简单，因为中国有数亿人曾经投身于这个运动，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就算不是每个人都说得清楚，至少可以指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说得清楚。但问题在于，参加文革的人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和派别，他们的立场、观点大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人们在文革中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经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人往往会讲出不同的文革故事，对于中学校长和老师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充满屈辱和折磨，对于不爱上课和害怕考试的学生，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还因为它确实如其发动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它很难比附于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能说它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有一点像，但细究起来又都不是。我们能说它是为了实现社会理想、公平正义的伟大实验，还是说它纯属一场权力斗争？这个问题把人们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在一般民众中如此，在学者专家中也是如此。

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不好作出判断和结论，还因为文革中充满了完全矛盾的事情和现象，口号是一回事，密室中的策划是另一回事；运动初期对自发的群众行动是一回事，运动后期则是另一回事；同样的事情，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回事，由“资产阶级司令部”来干就是另一回事。我在美国讲文革，美国左派来闹场，他们质问：“徐教授，文化大革命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得那么不好？”我的回答是：“你们看文革，是靠阅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我谈文革，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追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对文革这场悲剧和灾难的反思从现象到本质，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大胆。比如北京大学教师郭罗基对于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残忍处决发表文章“谁之罪？”提出文革时期中国“搞的是超专制主义、超法西斯主义”，张志新是这个制度下的“思想犯”，并且提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这样的追究吓坏了官方。虽然他们当时也在否定和谴责文革，但他们一定要保住产生文革的社会制度，一定要保住必须为文革承担罪责的毛泽东。当局强行压制了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文革教训”这一课的缺失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其基本事实还了解不充分，对其基本性质的判断还莫衷一是，这是缺课的表现。现在文革重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对文革的赞扬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研究文革，对其性质做一个认真的探讨。

#### ◇ 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毛泽东为什么而斗，是为了权力，还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包括消灭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地位，等等，斗争的目的决定我们对于文革性质的判断。在文革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通常用“路线斗争”来说明斗争中双方的分歧，“路线”与目的和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现在不去深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一般地认为，路线分歧包含方针、政策、意识形态的不同。

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广大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自然以为文革是关乎中国和世界命运、前途的斗争，在文革后期遭到失败、受到惩处的群众组织领袖至今还坚持这种观点。（1）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西方研究者也是从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角度理解这场运动。比如Victor C·Funnell说：“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在追求打破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区分，以防止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看来存在于苏联和东欧的资产阶级化。”（2）Theodore Hsi-en Chen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是‘修正主义’。共产党领导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少数孤立人群中，实际上在中国到处都有，其根子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因此，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教育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3）

很明显，思想和政策分歧不是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原因。刘少奇很快就被打倒了，但他的首要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对毛泽东表示屈服，说他愿意改正一切错误，说他准备交出一切权力。如果毛仅仅是想纠正刘少奇的错误，那么他的目的很早就可以达到。但毛泽东并未就此罢手，显然，毛要彻底干掉刘和他的所有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上面的观点难于对此作出说明，比如，毛泽东批判林彪，说他“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是“反党政治纲领”，这能用社会理想和革命目标来说明吗？又如，毛泽东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发动“批孔孟，批周公”运动，借口之牵强附会，今天我们除了嘲笑其手法拙劣，还能认真地当成意识形态的分歧吗？

所以，另一种观点直截了当地认为，毛发动文革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毛感到大权旁落，为了恢复他那权力不受挑战的地位，他要把竞争对手打下去。Simon Leys 在其书《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4〕这种观点具有一针见血的痛快，但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人们不难在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的观点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证明他们从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不久的50年代初一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其以后，两人在建国方略上确有不同。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既有政策分歧，又有权力斗争，为了坚持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引发了权力斗争。中国人熟悉的西方文革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持这种见解，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说：“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5〕Garg Dutt 和 V·P·Dutt 说：“在中国，斗争不可避免。这类斗争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对于在各种选择中如何拍板，领导常会产生分歧。政策分歧会发展为尖锐的，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与个性相关，并显得是在争权夺利。如果领导都是老谋深算、说一不二的人，那么争斗就会愈加激烈。有时，某个领导的自大狂、幻觉，至少，他的自我中心心态，他的疑心甚至于他的衰老，都是最高层分裂以及人头落地的重要原因。中国并未置身其外。”〔6〕

为何政策分歧会导致权力斗争？毛的最高地位和关于他一贯正确的政治神话是分不开的，他的权力和威望都建基于这种正确性。一旦这一点受到挑战，他就当不成“英明领袖”了。毛爱以皇帝自居，但他的权力来源却不同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来源于世袭，一个皇帝虚心纳谏可能会博得美名，万不得已时他甚至可以下“罪己诏”，作自我批评，但他仍然是皇帝。毛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党内批评，只有两种应付办法，一是找替罪者，如延安整风得罪的人太多，他把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二是猛烈反击，把反对意见打下去。他不能承认这是不同意见，而要说成是别有用心人的攻击，是两条路线或两个阶级的斗争，如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待彭德怀那样。这种做法，出于共产党运作方式的规律。我们说毛个性强、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但这不是意见分歧转化为权力斗争的唯一原因。体制也促使他在有意见分歧、遇到反对时以攻为守。

如果我们既承认政策、意见分歧，又承认权力斗争是发动文革的原因，那么何者更为重要呢？我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一旦以权力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文革发动之后的事态发展就只能按权力斗争的规则进行。意识形态、社会理想之类的因素，如果真有的话，也会退居到次要地位，它们在文革期间毛的政策方面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权力的考虑要现实、紧迫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广大民众起来造反的动力是权力斗争的考虑，而不是他在为他那成问题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找寄托，只不过这种考虑需要以意识形态的动人语句装扮起来而已。

#### ◇ 文革是一场伪群众运动和伪民主运动

对于判断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最难解的现象是，毛泽东是以广大受压制、受迫害的群众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文革中最流行的说法是，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相信群众、爱护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另一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压制群众、打击群众，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一些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为了实现平等、公平

和正义这一类社会理想，为了保持革命理想永不消退，为了使中国不至于蜕变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不惜带领广大群众，进攻那个以他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不惜以世所罕见的魄力，支持红卫兵造反，摧毁那个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体制。

文革运动初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以上说法。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下车伊始，他立即严厉谴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大中学学生在校园内自发的“革命行动”，他说，看到校园内的运动那么冷冷清清，他非常难过，他还厉声质问道：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一切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态度是如此坚决和鲜明，使得多数学生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他的一边，他们立下誓言“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6年10月上旬，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为了区别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文革派的官方提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个别具深意的概念）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份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他们是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的，他们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断定党组织整群众是整错了，要退还或者销毁整他们的材料。在这之前，人们对于党组织整群众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是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人们从来不敢指望事情会翻过来。但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真理和正义终于取得了胜利。被压制和得到解放的学生由衷地高呼：“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的文革干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由此，人们在理论高度上得到的结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群众路线，而刘少奇的路线就是类似国民党的训政那样的压制群众的路线。

事实上，在毛和刘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爱护群还是压制群众的路线，刘少奇的所有做法都是中共进行政治运动的惯常做法。1966年6、7月毛泽东故意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就是为了让刘少奇犯错误，在群众运动中引火烧身。其实，刘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请示过毛，毛故意含糊其辞，答复是“相机行事”，但当刘的压制行为已成既成事实之后，毛又借机发难，大发雷霆。当毛泽东利用学生打倒刘少奇之后，当学生经历了运动变得桀骜不驯之后，他决定把他们统统赶下政治舞台，这时他的压制手段不知被刘少奇要厉害多少倍。毛和刘的区别是——也仅仅是——敢不敢利用群众运动，敢不敢挑动和利用群众与党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如 Simon Leys 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一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而产生的。如果理解更深刻的话可以看到，这种不满本可以是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他们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当他们的作用完成之后，毛可以把他们抛到军事压制之下，用一批和原先一样的官员来代替他们。”〔7〕

说文革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纯粹只是宣传口号，真正实行的是“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求群众的，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群众组织在文革中的重大行动，不是响应公开的号召，就是听命于暗中的教唆。比如，对待中中央第4号人物陶铸，几天前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人物，毛一旦不满意，说打倒就打倒，中央文革小组一声令下，红卫兵的批判就蜂拥而至，令行禁止，群众“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过夜”。又如，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约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门单独见面，向他布置在社会上公开打倒刘少奇的任务，蒯大富欣然从命。12月25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出动5000余人，到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闹市区以狂呼口号、大撒传单、刷大标语等方式宣传打倒刘少奇。过了几天，又在同样的北京市中心地带播放刘少奇女儿刘涛揭发批判刘少奇的自我检查。这两次活动都引起了轰动，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洋洋得意，自以为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8〕事实上，文革中多数以“造反精神强”自傲的群众组织，莫不以揣摩“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要务，莫不以向毛泽东邀功为荣。

有人说，文革中群众享受“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空前的言论自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四大”是用来打倒刘少奇和其他所谓“走资派”的武器，批评的言论涉及毛泽东和其他毛派领导人，就变成了“反革命言论”，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安六条》，原名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就规定了言论的界限。文革中因言获罪的人不知有多少，比如遇罗克和张志新，又如写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中学生伊林、涤西。

文革中成立了无数个群众组织，有人据此说中国的民众在文革中享有（哪怕是短暂地享有）结社的自由，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本来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打倒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而成立的，把这样的组织说成是结社自由的产物，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湖北武汉测绘学院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时，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学生们自觉自愿地在其中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在党小组成立之前，“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五位学生党员，他们形成了核心领导班子。在商量成立武汉地区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时，他们最初拟名为“造反司令部”，经过讨论，改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一变动意味深长，虽然毛泽东已经说过“造反有理”，但这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学生，还是认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绝不愿留下丝毫可能产生其他联想或误解的余地。〔9〕

在文革中，被取缔和镇压的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事实上，各种群众组织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比如“左派组织”、“革命组织”、“保守组织”、“一般群众组织”，等等，只有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的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 ◇ 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无关，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如果说，苏俄的国家性质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左的极权主义，那么文革前的中国已经是具有相同性质，但在政策上更左的极权国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政策从左发展到极左，使中国的极权主义发展为极左的、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

我们可以从文革的结果来判断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达到的目的，并据此考察文革的性质。

文革前，毛泽东是中国的两位主席之一，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虽然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的含金量不如毛的党主席的含金量，但用陶铸的话来说，这毕竟是“双峰并立”。毛在文革中成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集“四个伟大”于一身，他与党的副主席及他的接班人之间的距离大大地拉开了。

文革前，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经过文革，毛泽东思想成了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成了马列主义的顶峰，通过中国官方的自我宣示，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党、政、军各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和山头，毛泽东虽然有自己最大的派系，并且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但并不是唯一的，文革消灭了毛派之外的所有派系。文革废止了各个级别的党政领导，并重新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原有的干部要视其是否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决定能否进入新的权力机构，这使得文革成为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清洗。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种最高领袖直接动员、命令亿万群众的新型模式，使得原来的党政官僚机构或者科层结构的传达命令的功能大部失效，这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成为最典型的极权形式。

文革以“一大二公”和“穷过渡”的方式跨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强行向共产主义过渡；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严格的禁欲主义泯灭人性中的自然、合理的要求，使中国亿万民众成为最高领袖为实现其乌托邦幻想和称雄世界野心的工具与牺牲品。

文革以“自力更生”为口号自断与国际经贸体系的联系，使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低水平发展；文革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煽动东南亚的颠覆和叛乱，支持世界各国的骚乱和破坏活动，是世界的动乱之源。

总而言之，说文革是一场悲剧和浩劫，并不为过。在制度、思想、历史、文化、人性层面探讨这场悲剧和浩劫发生的原因，将有益于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和现代化。防止这场悲剧和浩劫的重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1〕比如，参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475页；亦见杨道远：《奉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460页。

〔2〕Victor C·Funnell, Social Stratific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VII, Iss·2, 1968, pp14—20。

(3) Heodore Hsi-en Chen, A Nation in Agon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 6, 1966, pp15—20。

(4)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13。

(5)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3页。

(6) Garg Dutt and V.P.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2。

(7)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52—53

(8) 见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第163—173页。

(9) 杨道远：《奉献》，第34—41页。

□ 原载《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2018年9月  
~~~~~

### 【史实辨析】

#### 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

• 艾 群 •

值此文革发生50周年之际，重读《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回忆录》）。聂元梓早年参加革命，文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造反派标志性人物，文革后判处有期徒刑17年；耄耋之年痛定思痛，回首往事，兼以反省与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北大文革的模式。然而作者囿于自身局限以及选择性叙述，有利的使用加法，不利的使用减法，致使诸多事实模糊不清。兹择其大端一抒己见，就教于聂元梓老人及方家。

#### 一、第一张大字报引爆全国造反天下大乱

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至少自1965年1月始，毛泽东就围绕着搞掉刘少奇这一目标，策动了一系列的部署和举措：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连续作出严厉的批示；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全国范围的大批判；1966年2月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被文艺黑线统治和专政；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加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尽管紧锣密鼓环环相逼，充其量只是口诛笔伐，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机器照常运行，工农商学兵该干嘛还干嘛，距离搞掉刘少奇这一目标相去甚远。当此时，第一张大字报问世了，它开创了任意炮轰党政领导的先例。毛泽东抓住这个契机，下令全国广播，于是大批判升级为全国造反，文化革命升级为武化革命，揪斗党政领导的造反运动席卷全国。这时毛泽东满意地宣称“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接着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实现了“搞掉刘少奇”这一既定目标；与此同时开启了陷各族人民于水火的十年动乱。《回忆录》则轻描淡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历史作用。

对于第一张大字报的问世过程，《回忆录》称：聂元梓等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派驻北大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康生夫人），“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此后聂元梓等七人写作并于5月25日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回忆录》以“关于大字报的辩白”为题专门写了一个章节的内容，说明写大字报纯粹是自发行，没有任何上层人物的授意和指使，从而与中央文革撇清关系。

但是这不是事情的全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披露，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曹轶欧要陈守一“领头和聂元梓等共同来搞”，被陈严词拒绝，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该文指出，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聂元梓等人写出的。

由此可见，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属于康生、曹轶欧整个阴谋的一部分。

## 二、失忆了某些重要情节

1967年9月1日江青当众夸奖聂元梓：“聂元梓在文化革命开始立了两大功：第一，她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第二，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

《回忆录》第十二章“‘除隐患’始末”写道：1967年春天，“我自己不便直接出面，就让孙蓬一找几个可靠的人，选择了赵建文等，在北大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专门搞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追查他们的后台。”《回忆录》叙述除隐患战斗队围绕“专门搞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一工作中心做了大量调查，不料追来追去追到康生头上，无奈只好放弃。本来“除隐患”积极执行四人帮的“揪叛徒”阴谋，《回忆录》却将其置换成反四人帮的壮举，编排得太离奇了吧？这与江青所说“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不符，与聂元梓本人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也不相符。

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7年4月14日，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聂元梓找到康生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聂元梓汇报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康生掏出笔来，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返校后聂元梓把康生的手谕复印出来，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揪叛徒兵团，把“揪叛徒”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方案写成报告，呈交康生。与此同时，聂元梓以康生手谕为据，写信给谢富治要求提供帮助。谢富治见信后，派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见揪叛徒兵团的负责人，准许他们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查阅机密档案。揪叛徒兵团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持有一份康生手谕复印件，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活动。经过一段调查，在聂元梓的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从而加剧了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迫害。

失忆重要情节的例子还有关于1966年赴上海造反。《回忆录》第十章“上海串联真相”一口咬定“毛主席要我去上海”，并详细记述：1966年11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两次来北大，单独向聂元梓传达毛泽东要聂元梓赴上海造反的指示精神，聂元梓遵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带队赴上海向上海市委造反。《回忆录》也指出，在文革结束聂元梓受审时，李讷拒绝为此向法庭作证。《回忆录》特别强调，赴上海造反与江青没有半点关系。但是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江青确实给了聂元梓指示，指示聂元梓带队去上海造反。

再例如《回忆录》标榜自己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指责一些学校学生参与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挑起武斗。此处又一次明显失忆，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8年3月28日夜，即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前夜，聂元梓在临湖轩向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头目下达指令：“打，你们要打，就打吧！”从而发起3月29日大规模武斗。

另有其他事件中失忆重要情节，不再一一例举。

### 三、关于北大两派武斗

校文革是北京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着全校的行政权、人事权、财务权，聂元梓是校文革第一把手，大权在握；新北大公社是官办群众组织，效忠于聂元梓；二者合而为一，两块牌子一个实体，组织严密实力雄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由几个大小不同的反聂派组织和大批散兵游勇联合而成，号称七千人，大多数态度上是反聂派，行动上逍遥派，真正参加活动的不过一二千人；没有财务来源，活动经费全靠募捐。二者力量悬殊，明眼人都清楚，动起武来，后者之于前者不堪一击，如果说井冈山兵团挑起武斗，那无异他们自己于找死。

关于北大两派武斗，《回忆录》的描述是：1968年3月25日下午，北京七所大学的一万名学生来到北大发动武斗，聂元梓强拉谢富治来到北大，谢富治通过广播讲话要求七所学校的学生撤离北大，从而制止了一场大规模武斗。但是，“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发动武斗，蠢蠢欲动……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

《回忆录》回避了这一事实：3月28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须知，此前聂元梓所称北大武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其时所称武斗有着两个不同的含义：文革初期所说武斗，指的是对批斗对象实施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相应的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两派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充其量只能算作打架斗殴。真正的武斗，准确说应该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成规模的武装冲突，相应的口号是“文攻武卫”。1968年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北京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即成规模的武装冲突，是3月28日夜聂元梓在临湖轩一声令下之后，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于3月29日凌晨发起的。

遵照聂元梓的武斗指令，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向31楼发起武装进攻。31楼住着井冈山兵团的骨干力量0363（化学系63级）支队。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布置武斗任务时说：化学系（新北大公社）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为避免同班两派同学互相残杀，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总指挥高云鹏调集09系武斗人员攻打31楼，怕他们不了解31楼两派住宿情况，事先在有井冈山兵团居住的宿舍都做了记号。29日凌晨1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统一头戴柳条帽，身穿军棉袄，手持扎枪，发起突袭，驱赶井冈山兵团同学，武装占领31楼。他们遇到同一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住在这里的新北大公社同学有的被误伤，以为打伤他们的是井冈山兵团，从而大喊“井冈山发起武斗！”此时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持续广播：“井冈山兵团悍然挑起武斗！”颠倒是非恃强占领舆论制高点。



天亮之后，聂元梓叫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一同视察武斗现场，遭遇愤怒至极的井冈山兵团同学围观抗议。《回忆录》说：“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

这段描述太夸张了！其实樊能廷拿的不是匕首而是一把普通的中号螺丝刀（改锥），而且距离聂元梓很远，未触及聂元梓身体任何部位，没有伤及聂元梓，更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这样夸张的桥段。

当晚，谢富治赶到北大宣读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即交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与此同时校文革发出捉拿凶手的《通缉令》。4月4日李钟奇来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4月26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乘胜追击，发动大规模武斗，全面围剿井冈山兵团；后者则全线溃败，最后退守在临街的28、30、32、35、36、37等六栋楼中。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这六栋楼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在四周楼顶架设大型弹弓居高临下火力封锁。此刻，在武斗中惨败的井冈山兵团已濒临绝境。其间，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无端打死并未参加武斗的三名同学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炜。

北大武斗外溢效应迅速蔓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最高当局无奈于7月28日凌晨由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大造反派领袖，当面训诫严厉抨击，并派大批工人、军队进驻各校，北京武斗方得平息。

令我们这一代痛心疾首的文革已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当年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早该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反思过去，共同面对未来。据悉后来聂元梓对这部《回忆录》也不甚满意，那么我们期待聂元梓在安享晚年之余，庶几留下一些更为真实的回忆。

〔作者简介：艾群，1963年至1968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总编辑，2005年退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